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二三三）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九七期 ——  
（二〇〇四年十月四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410a）

---

【读书笔记】武斗的结束，怀疑的开始	徐友渔
【史海钩沉】“七·二七事件”述评	唐少杰
【往事如烟】老红卫兵刘卫东	廖亦武
【难忘岁月】“文革”万花筒：武斗	江岩声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读书笔记】

武斗的结束，怀疑的开始

• 徐友渔 •

唐少杰这本书的题目是《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从时间维度立意，说的是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预示了文革中整个红卫兵造反运动的衰落。其实，此书的内容也是空间上的浓缩，论述了这场运动的全面情况。用毛泽东时代常用的、由毛泽东本人提出的政治术语来说，就是“解剖麻雀”。“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从清华可以看到全国。不过，当我们这些亲历过文革的人想到威震全国的“清华井冈山”和声名赫赫的“蒯司令”时，一定不想用麻雀这个意象。清华大学的造反派红卫兵是虎，有威有势，是毛泽东放出来咬刘少奇等人的猛虎；但另一方面，它又是毛泽东手中的提线木偶，毛的念头一转，一声令下，“清华井冈山”和“蒯司令”这样的庞然大物就顷刻瓦解、立即覆灭。

这本书以理性的口气和分析的方法讲述了一个悲剧，这远远不止是清华人的悲剧，它是文革这幕大悲剧的缩影。

清华的文革历程体现了文革的全部特征：文革前以“阶级斗争”为口号的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使一部分人成为“阶级敌人”和“牛鬼蛇神”；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灌输，学

生争当“革命接班人”的政治竞争，高级干部子女的优越地位；单位领导以旧思维、旧方式处理文革新形势，工作组领导运动的规范模式与直接响应毛泽东“造反”号召的学生发生冲突；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强力支持下，造反派击败有政治背景的、以干部子女为领导的保守派红卫兵，并任毛和“文革小组”的驱策，在打倒刘少奇、夺“走资派”权的斗争中冲锋陷阵；造反派分化为激进派和温和派，观点之争和权力之争交织在一起，最后演化为旷日持久的武斗；在毛的亲自部署下，被“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强行赶下政治舞台，昔日意气风发的（甚至骄横不可一世的）“革命小将”变得灰头土脸、沮丧迷茫。

但是，清华的文革又有其特点，描述、分析这些特征正是唐少杰《一叶知秋》一书任务之所在、价值之所在。在依我之见，值得指出的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因为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成员，清华的文革运动可以说是被刘遥控指挥，毛泽东要以“工作组镇压群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理由打倒刘，势必把清华作为突破口。也正因为如此，被工作组压制得最厉害的蒯大富才得到最高当局的关注，被树为反工作组英雄，张春桥亲自召见蒯大富，向他交底，怂恿他率先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而“清华井冈山”也演出了轰动全国的“智擒王光美”、“批斗王光美”的闹剧。蒯大富成为造反派红卫兵的重要领袖，“清华井冈山”成为王牌主力，在全国各地指挥运动，在“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中次次抢占先机，和清华的文革运动一开始就与刘少奇有关这一事实密不可分。

第二，文革前蒋南翔在清华搞“政治、学习双肩挑”、“又红又专”，极有成效，培养了一支在原教旨主义意义上而不是在晚年毛泽东思想意义上的革命化干部队伍，和其它地方、其它单位的干部大多数胆小怕事、消极观望不同，清华的许多干部政治积极性高，他们很早就介入运动，甚至积极介入两派的斗争，因此，清华的干部问题显得十分突出。而由于有不少干部当了学生组织的“黑高参”，清华的两派斗争就呈现高水平、长期、复杂的态势。

第三，“清华井冈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王牌军，而其对立面“四一四”也非弱旅，尤其是其头领之一周泉纁写出《四一四思潮必胜》，集中表达了造反派群众组织中较温和保守一派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纲领，被毛称为理论家。所以，清华不但以率先打倒刘少奇和百日武斗著名，也以“井冈山”和“四一四”两派的思想理论斗争著名。

第四、与清华在运动中轰轰烈烈、大出风头相对比，清华人后来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完全乏善可陈。这初看起来是奇怪的，不少对文革知情不多、涉入不深的人，后来在反思和批判文革中起了重要作用，为甚么最投入和受打击最突然、最厉害的人，对文革反而提不出甚么批判性看法呢？难道越了解文革的真实，越觉得文革不该批判？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大致说来，正因为卷入太深，清华人没有从文革的恩怨（小的恩怨如两派的派性之争，大的恩怨如与毛派和“走资派”的关系）中醒悟和解脱出来；昔日的辉煌成了否定过去、更换观念的负担；也许这也算一个原因：文革前清华强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使清华的技术型人才难于跳出旧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的窠臼。

毛泽东以强力结束清华百日大武斗为契机，把造反派红卫兵赶下政治舞台，也由此摆脱“放鬼容易收鬼难”的尴尬局面。但是，事情免不了有两个方面：失势和失宠的红卫兵在困惑不解和怨气冲天之余也这样发问：为甚么要用我们就说“革命小将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正确”，不用我们就说“小将犯错误”？为甚么一会儿说“路线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一会儿又说“不实行大联合就是闹派性”？相当多的人由自己的可悲下场意识到自己不过是被利用，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开始对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和性质发出疑问。

因此，清华百日大武斗具有双重含义：它既结束了红卫兵造反运动，也开启了这一代人对

文革、对自己行动意义的反思；它结束的也是盲从和狂热，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开始在这一代人心中暗淡。

当然，人们也会对清华的百日大武斗提出一系列问题，比如，为甚么这些高智商、入读中国最好学校的年轻人，会相互厮杀得红了眼？他们真正把对方当敌人吗？他们是出于信念和理想，还是出于利益而投入斗争的？

本书力图回答这些问题，在“历史的反思：谈‘红卫兵情结’”这一节中，作者总结分析了红卫兵的“造反有理”情结、准救世主情结、革命实用情结、泛敌意识情结、迷信领袖情结、暴力崇尚情结、血统出身情结、道德专政情结、英雄主义情结和理想至上情结。作者的努力，无论对于不了解文革而想明白文革是怎么回事的人，还是经历过文革、对其有所了解而想理解得更深入更全面的人，都有很大启迪。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该校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多部学术著作中，其中就有三部是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著作；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今年还出版了马继森的《外交部文革纪实》。听说今后还会有关于文革的著作要出版，这非常令人欣慰和钦佩。文革研究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顽强而稳步地推进，中文著述在迅速扩大和发挥影响，历史意识中断的危险至少已不是迫在眉睫。但是，从世界范围看，文革研究规模依然太小，不成势头，而在中国大陆更几乎仍然是空白。我衷心希望有条件的学术研究机构能够努力，促进更多中文的文革研究著作面世。

~~~~~

## 【史海钩沉】

### “七·二七事件”述评

• 唐少杰 •

（本刊曾在 z k 0 1 0 4 a 刊登唐少杰所撰“清华文革‘七·二七事件’”一文。本文是该文的扩充和完善——编者）

1968年7月27日，在北京清华大学发生的“七·二七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的一个著名事件，它不仅给教育界等领域的文革发展带来了重大的转折，而且对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文革历史中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 一、起因

1967年4月14日，清华大学文革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分裂为“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和“四一四总部”（简称四派）。两派围绕着如何进行文革的策略和方法、如何评价和对待文革前任职的干部、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的历史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团派主张“文革阶级关系大翻个儿论”、“文革前十七年黑线主导论”和“文革是一场批（判）干（部）运动论”；四派主张“文革阶级关系不变论”、“文革前十七年红线主导论”和“文革应使干部发挥中坚作用论”。两派的论战伴随着小规模冲突，最主要的是，两派在建立清华大学文革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所要结合的干部问题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加紧打击和迫害对方所倚重的干部。两派的矛盾和对立经过一年多的发展相持不下而愈演愈烈，终于由团派为压倒和消灭四派而打破“文攻”局面，于1968年4月23日发动了大武斗。

史称“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的事件给清华方面造成了13人死亡，400多人受伤，30余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当时人民币逾1000万元，全校10000多名师生员工纷纷离校逃难，昔日美丽的清华园成为武斗的血与火的战场。

1968年7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针对许多高等院校武斗严重情况，多次召开有关制止武斗、宣传并贯彻中共中央“7·3”布告（关于制止广西壮族自治区武斗的布告）精神的有关会议，准备在中关村召开制止武斗的群众大会和派遣宣传队在高校所在地进行宣传活动。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指示团派提交关于制止武斗的方案，并向团派头目打招呼说可能要派工人游行队伍进入清华宣传。

7月6日至25日，团派数次召开总部会议，讨论制止武斗问题。团派一些武斗指挥人员强调：“7·3”布告不适用于清华；团派与四派的武斗有特殊性；团派必须用攻占四派所在的科学馆的既定事实来求得武斗后的主动、有利地位。团派总部向北京市革委会等有关方面提出停止武斗的三个条件：一、由北京卫戍区正式逮捕四派核心人物；二、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进校制止武斗，首先要拆除科学馆工事；三、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及北京市革委会直接解决清华问题。团派对中共中央及北京市革委会关于制止武斗的指示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至少没有做出应有的预测，更不用说做出切实的响应了。

相反，自6月下旬以来，努力相对弱小的四派多次（最后一次是7月26日）要求中共中央及北京市革委会派遣宣传队进驻清华，或对清华大学实行军事管制，以求真正打破团派在清华的霸主地位，结束武斗，从而结束自己在整个武斗中的被动地位。

尽管我们至今还不知道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决定向清华大学派遣当时旨在制止武斗的宣传队的详细内情，但是，据后来迟群多次讲，从毛泽东决定派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到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前后时间只有十几个小时。7月26日17时30分至次日凌晨2时。北京市革委会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开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的动员部署大会，市革委会负责人和约有63个单位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7月27日上午组成以工人为主的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

## 二、过程

1968年7月27日清晨，北京市61个单位3万多工人组成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最初称“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称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宣队”）从各自单位出发，奉命开往两派武斗人员总共不足千人（一说600人）的清华大学，进行制止武斗、拆除工事、宣传“7·3”布告等文件的工作。该工宣队的领导人实际上由中共中央警卫部队（8341）在京一些单位的军代表担任，他们负有特殊使命。约9至10时，工宣队各路队伍抵达清华南门、西门（主要队伍在此）及东门。工宣队指挥部要求全部队伍必须11时开进清华校内。

团派上上下下对于这突如其来、声势浩大的工宣队，事先竟毫无所知（把数万人的工宣队讹传成10多万人），也没有准备，但是他们十分明白，工宣队的开进意味着团派称霸清华的结束。团派作战部部长带队带武器赶至西门阻拦工宣队。后来，由于南门等处先进来的工宣队开通西门，才使整个工宣队于中午时分开进清华校内。工宣队下属的8个团按照预先所定的计划差不多同时到达各自的任务所在的方位，以分片包干而不是逐一推进的方式很快完成了对两派据点的“分割”和“包围”，发起宣传、喊话“攻势”，以众多的人数（整个工宣队与两派武斗

人员之比约为50比1)把遇到的武斗人员团团围住(实为扣住),进行宣讲工作。同时,开始拆除工事,清除路障及铁丝网、电网等。

11时30分,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通知蒯大富(因蒯不在,让人转告):工宣队要开进清华,要团派大力支持工宣队。12时许,从北京站接人刚回来的蒯大富在静斋屋顶大声斥责前来“包围”的工宣队,责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四派占据的主楼而来静斋,表示决不下武器,尔后召集团派总部会议。会议决定:一、紧急上告北京市革委会和中共中央;二、命令各据点抵抗工宣队,必要时可使用武器。团派头头们已意识到团派到了生死关头,打电话和派不易识破的小孩穿过工宣队重重包围队伍,把抵抗命令传达到团派各武斗据点。

14时多,蒯大富赴北京市革委会“告状”,结果与市革委会负责人大吵一通,他责问吴德:“谁把几万工人派到清华,把我们学校打得一塌糊涂?”他警告不要把清华井冈山当成“上柴联司”(上海柴油机厂一群众组织,1967年8月4日,被王洪文指挥的“工总司”队伍打垮,一一注)来打,“我们不是好欺侮的”,扬言如果要把清华井冈山当成“上柴联司”来打,“我们就以死一拼”。晚饭后,在谢富治、吴德、工宣队代表与蒯参加的会议上,谢命令蒯: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据点;谢指示蒯与工宣队代表一起立即回清华实施上述命令。

在清华,中午时分,工宣队进入科学馆,查缴四派武器,馆内人员被全部带出。工宣队抵近礼堂时,团派人员引爆电发地雷。经过谈判,工宣队被允许进入礼堂。在礼堂里,工宣队搜查出团派一些武器及武斗工具。工宣队还在甲、乙、丙所搜出团派大批雷管、炸药、长矛和自制枪支等。工宣队在电厂与团派守军对峙,团派头目下令开启电网电闸,以阻滞工宣队进入电厂。

13时多,静斋(团派总部所在处)的团派队伍在团派作战部部长带领下,用石块、长矛等冲击在静斋后门的工宣队,使许多工人掉进荷花池(即朱自清先生著名散文《荷塘月色》中的荷塘),并扣留了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的汽车、司机和公文包。15时许,40多名工人、军代表先后被关进静斋,遭审讯或殴打。静斋的团派队伍袭击甲、乙所和工字厅等处的工宣队;16时许,配合明斋等地的团派队伍攻打大礼堂周围的工宣队,约天黑时,袭击丙所。这支队伍一天下来,使用长矛和手榴弹,连刺带炸,使100多名工人负伤。仅作战部部长一人就用长矛刺中7名工宣队员的腰或腿或臂部。

14时至15时许,团派60余人在明斋驱赶工宣队,刺伤、砸伤、炸伤数十名工人,把那里的工宣队赶至礼堂一带。16时左右,这支队伍在三院与其他团派队伍一起向礼堂周围的工宣队发起进攻,动用了手榴弹、长矛、石块、弹弓等,造成130余人负伤,一军代表被炸伤,一老工人被刺中右臂右肺。

约14时,工宣队完成了对10、11、12号楼的“包围”。15时许,宣传队开始进入10号楼,并与团派守楼者逐层对阵;16时许,守楼者两边夹击,俘虏一些工人,迫使另一些工人跳楼。17时许,10、11、12号楼的团派人员同时“突围”,向工宣队冲击,刺伤、炸伤、砸伤、打伤许多工人,把大批工人赶至东大操场,并破坏停放在那里工宣队的车辆,抢走工宣队的一些食品、物资等。约17时30分,在10号楼一楼楼道内,王松林(北京第二机床厂副科长)被团派仍出的手榴弹炸死。18时许,天下起雨来,从10号楼撤至东大操场南端的张旭涛(北京541厂工人)被追赶的团派用手榴弹炸死。18时许,在撤至12号楼西北面场地的工宣队中,潘志洪(北京市供电局工人)被追赶的团派用手榴弹炸死。

17时至20时,住在13号楼的数十名外地造反派进京上访人员,在团派的鼓动下,用团派提供的武器,冲出楼,加入追赶、袭击工宣队队员的活动,致使一些工人受伤。

自午后至深夜，第一教室楼等地的团派武斗据点，各自为战，对其据点周围的宣传队临时营地发动袭击，绑架工宣队队员，伏击工宣队要经过的道路等，使工人受伤人数增加。

21时左右，团派几个头目（蒯大富不在）在静斋开会，决定深夜攻打9003大楼。他们以为工宣队指挥部设在该楼。更重要的是，该楼是团派最大的武器试制、生产基地之一，楼内仅手榴弹就存有数百颗。约13时，工宣队包围该楼后，开始拆除楼外工事、障碍，并破开门障，进入楼内。团派30多名守军不得不逐楼层拼斗，打伤10多名工人后，退至楼顶，待深夜团派的60余人增援队伍赶来时，迅速冲下，用长矛刺死在三楼一房间小息的韩现忠（北京第一食品厂工人），打伤许多工人。约23时20分，楼外的团派人员开枪打死李文元（北京橡胶四厂工人）。两支队伍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使团派重新占领9003大楼，而楼外实际上有数千名工人待命。直至7月29日，团派在该楼顶架起望远镜，每个楼角架起一门土炮，每个窗口处都放有硫酸瓶、手榴弹、暖气片等，大有决以死战的架势。中午，该楼团派打出大标语：“雪里梅花开不败，井冈山人敢上断头台”，“生做毛主席的红小兵，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毛主席接见蒯大富是对井冈山人最大的爱护”，“蒯大富”三个字写得大大的。该楼的团派一直到7月30日中午被迫由解放军“保护”撤出，这也是百日大武斗的最后一个据点。

约20时，与工宣队代表一起返回清华的蒯大富被带至清华园中学一教室，与工宣队主要指挥者、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主任兼军代表迟群等人商讨停止武斗事情，经过争吵，达成四项协议：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据点。双方约22时45分签字后，蒯与5名工人代表、1名军代表前往明斋团派广播台落实广播上述协议。到达明斋后，蒯把代表们搁置一旁，在另一房间召开团派头目及有关人员30多人参加的会议。

蒯大富先讲了形势的严峻，又讲了与工人对抗下去的危险性，他说：“我今天跑出去以后，到市革委会见到吴德，其他人没有见到。吴德同工人站在一起。吴德告诉我，说我们打死了工人，打伤的工人特别多，北京大医院已经住不下了。我们今天已经闯了大祸。不打死人还好办，一打死人，我们向中央没法交待。现在，工人对我们恨极了，要和我们拼命。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留在清华继续和工人打，另一条是退出清华。”讲到这里，多数人反对逃跑，表示要留下来继续打。蒯接着说：“如果我们留下来，也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明天我们用我们的全部武器、弹药再和工人打一次，那工人的死伤就更不得了；另一条是我们打输了，我们就可能被几万工人打得全军覆没，和‘上柴联司’下场一样，这两条路都是死路。唯一的活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们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这么大的事件，中央马上就知道。只要中央知道了，一切就好办了，中央会救我们。请大家相信，有人在，就有清华井冈山在。”“我们跑出去，我们就是弱者，这样，在中央面前，我们就好说话”。经过两个小时左右的激烈争吵，尽管有人提出拉队伍去京郊山区打游击，但会议还是决定7月27凌晨2时30分前，团派全部人马撤至北京航空学院（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企图给工宣队一个难以呆下去的“空校”。

7月28日4时左右，团派一支数十人的队伍乘车撤往在昌平境内的清华核能研究单位200号，因司机数日未眠，驾车睡着，行至沙河附近，车翻入路旁稻田。一团派人员上车时把携带的手榴弹环拉出，以防外人截车。车翻时，手榴弹被引爆，炸死2人，炸伤5人。

在四派那里，工宣队在27日中午时分进入主楼。四派一些人向工宣队讲“条件”，不愿意同时交出武器和拆除工事，担心的是团派反扑，也不愿意让工宣队离开，怕的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制止住团派。四派主要领导人已由多名工宣队队员“陪行”，于13时40分写好并签署了“七条命令”（主要是命令四派人员放下武器，停止武斗，拆除工事等），但又担心情况有变，以找发电机等为借口，迟迟于16时才广播了这七条命令。然而，四派一些人还是根据其头头指示，

藏匿部分武器，以防团派日后反击。

四派竭力劝说工宣队先去拆除团派工事，收缴团派武器，尚不知工宣队在同时拆除两派工事和收缴两派武器。当看到工宣队冒险把围困于科学馆近百日的四派队伍救出并带至主楼后，四派上上下下的心情才好过一些。四派头头不断催促工宣队“拿下”对主楼四派据点威胁最大的9003大楼的团派据点。“七·二七事件”最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不存在四派与工宣队相抗衡、相冲突的问题。

### 三、结局

1968年7月27日，不是团派与四派的大武斗之日，而是团派向工宣队挞伐的血战之日。在这一天的12个小时（从正午到子夜）里，工宣队有5人牺牲；有731人受伤，其中重伤149人（工人139人，军代表10人），轻伤者582人（工人552人，军代表30人），被抓者143人（9工人109人，军代表34人）。工宣队扣留了100余名团派人员。百日大武斗以工宣队控制了清华局势、团派撤离清华、四派认可工宣队而暂告结束。

“七·二七事件”直接而又迅猛地震动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致使清华大学的文革又一次在全国文革发展中成为转折的关键点。百日大武斗特别是“七·二七事件”表明，象清华两派这样旷日持久的对立和冲突，象“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这样一个群众组织的命运和结局，在1968年7月底，已到了非得由毛泽东本人直接过问和直接干预的地步了。百日大武斗的最后残局，特别是7月27日工宣队开进清华大学所遭受的惨重伤亡发生后的短短数小时，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决定亲自解决由百日大武斗所带来的问题。从7月27日至28日的一系列活动中不难看出，不仅清华大学处在血与火的武斗动荡之中，而且当时中共中央领导层也处在焦急不安的状态中。

据毛泽东的警卫人员回忆：1968年7月28日凌晨两点多，入睡不久的毛泽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当毛泽东得知了清华流血事件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脱口而出：“造反派，真的反了？！”

毛泽东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他在118厅先仔细倾听了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成员和工宣队的代表几方情况汇报，后决定召见北京红卫兵所谓“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昌、谭厚兰和王大宾“谈话”。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召见红卫兵领袖“谈话”。

从7月26日毛泽东亲自决定派遣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到7月28日毛泽东召见红卫兵领袖“谈话”，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中共中央领导层决心在北京众多高等院校直至全国范围内结束武斗，并通过清华大学来树立一个从外部依靠工人群众结束武斗的典型。

7月28日清晨5时30分，蒯大富在北京市内电报大楼致电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

7月27日在黑手昼夜策划下，假借宣传七三布告，挑动11万不明真相的工人，携带凶器，突然包围、洗劫清华园。我井冈山战士数百人遭毒打，数千人被捕未救。为避免跟工人再发生冲突，我井冈山战士全部撤出清华，衣食无着，生命安全无保证，清华井冈山生命垂危，形势万分危急。向中央呼救，向毛主席呼救，寻求中央马上接见。

这一电报显然带有夸张色彩。蒯大富此时认为工宣队背后有“黑手”指使，此话给毛泽东

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一个多小时后，毛泽东在召见“五大领袖”时对蒯大富直言不讳地说，他本人就是这个“黑手”。

蒯大富发完电报，从市内刚回到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市革委会来电话通知他参加中央领导人的召见。蒯大富接到此通知后怀疑此事，担心遭“黑手”暗算，后由聂元梓亲自通话，才前去人民大会堂。

7月28日3时30分至8时30分，毛泽东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毛泽东的警卫人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为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对“五大领袖”一一进行搜查。蒯大富到达人民大会堂时已7点许。警卫人员让他把武器、刀子等放下，蒯大富不听，两名警卫人员上前下了他的武器。

谢富治把浑身泥水的蒯大富带进会场。蒯大富没有想到映入眼帘的竟是端坐在沙发上、身着白衬衣的毛泽东，百感交集地一头扑进毛泽东的怀里，大哭起来。毛泽东、江青等人也流下了眼泪。这时先前到达的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已汇报完毕。参加召见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吴德、黄作珍等。

毛泽东在这次召见中表现出对清华团派及蒯大富的复杂感情。毛泽东关切地向蒯大富问起团派总部委员鲍长康、刘才堂的名字和情况，他说：“井冈山小将一个不能抓，一个不能打”。“抓了七个总部委员，一律放掉”。毛泽东问蒯大富：“你们井冈山的人现在怎么样？”蒯大富答道：“一部分在北航，一部分跑到城里散了”。毛泽东对韩爱晶说：“你们不是亲密战友吗？要好好招待他们”。毛泽东还向蒯大富问起团派小报《井冈山》为什么近来看不到了？蒯大富答道这是因为近来出版、发行渠道不畅，等等。毛泽东两次言不由衷地说道：“十万工人进清华，四一四高兴，井冈山不高兴，我也不高兴。”但是，毛泽东又明确地告知在场的人们，派遣工宣队的决定不容怀疑，更不容抵抗，“蒯大富不是要抓黑手吗？这个黑手就是我，他也不来抓。”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就“七·二七事件”对蒯大富及团派立刻加以“问罪”或“惩治”。

同时，毛泽东也并不看好四派，他认为四派在清华上台不行。对于清华文革动态了如指掌的毛泽东对“四一四思潮”进行了评判：“《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我仔细读过了。它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不能必胜的。”然而，毛泽东却下令释放有关方面关押的《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的作者周泉纁。在这次召见中，毛泽东对四派的印象和评价总的来说不如他对团派的印象和评价。但是，今天看来，1967年4月至1968年7月，毛泽东并没有明确地肯定、支持或否定、反对清华文革两派中的任何一派，只是缘于百日大武斗，毛泽东的决策才使两派殊途同归，自行消解。

尽管毛泽东不愿意看到清华文革出现的百日大武斗，但是在决定派遣数万名工人组成的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时，他是否想到了进驻时的结局呢？毛泽东是否已充分预想或估计到了以扭转清华文革形势为契机而要使他发动和领导的文革所发生的转折呢？换言之，暂且撇开历史已发生的不可逆转或者说无法更改的事实，我们试图作出猜测：如果清华团派事先知道了毛泽东派遣工宣队的“决定”，不是以武力对抗工宣队进驻而是和平地顺从工宣队的进驻乃至“领导”，那么，不仅是清华的文革，而且整个文革又会出现什么呢？是否会使文革发生1968年秋季左右那样较大的转折呢？毛泽东本人在派出工宣队时，他本人所期待的又是一种什么情景呢？尽管人们永远不会给出确定无疑的答案，尽管人们会说历史本身不是假设，但是这种猜问或由然而来的诸多推测有助于开阔我们对文革的种种历史可能性和或然性的视野。

缘于清华百日大武斗的毛泽东“七·二八召见”，也是毛泽东对他与高等院校的文革造反派



群众之关系的一次重整。根据正式公布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可以看出：

1) 以清华百日大武斗特别是“七·二七事件”为契机，毛泽东对红卫兵领袖的严厉批评表明：毛泽东对群众运动及造反派已失去信心，对造反派领袖及红卫兵领袖已不抱多大希望。他似乎开始告别他过去屡用屡爽的群众运动模式。毛泽东在1968年之后实际上已不再“启用”文革初期的那种群众运动模式了，他再也不想使群众运动从自己手中“失控”，例如，他在1973—1974年的批林批孔和1976年的批邓中，多次强调不搞群众运动模式。1968年之后出现的一些文革群众运动的东西，不过是文革头两、三年群众运动的回声或遗迹。

2) 毛泽东决心，在北京地区乃至全国结束群众武斗，为达到此目的，他必然酝酿淘汰文革初期效过犬马之劳的红卫兵领袖，甚至威胁说，不惜动用正规军武力来结束群众武斗。毛泽东的这次召见谈话实质上是对文革群众武斗的“最后通牒”。

3) 毛泽东似乎对北京高等院校的群众派别分成“天派、地派”十分不理解，他希望两派搞成一派。而文革群众之所以分成两派，恰恰是沿着毛泽东的文革策略演化而来的。毛泽东在这里已“超脱”了两派对立的实际问题，他已逐步开始把群众问题从他的文革全局战略中加以淡化。

4) 毛泽东对群众武斗所带来的教育界文革如何搞下去的问题也是力不从心。他提出教育如何搞下去的四个办法，表明他开始置换教育界文革的主角，至少表明他开始考虑把学校现有的青年学生从整体上列入文革中接受“再教育”的对象。这一点在毛泽东8月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中得到体现。

5) 毛泽东决定派遣工宣队进驻高等院校，在他看来，根本没有事先“通知”造反派及团派的必要，也根本没有对此“讨论”或“讨价还价”的余地。正是在这次召见中，毛泽东下令，为了防止红卫兵领袖们及其各自相关的群众象以前那样篡改、曲解或片面引用他的指示，把这次召见的谈话进行录音备案。毛泽东对于红卫兵领袖及其麾下的群众不信任感，由此可见一斑。

6) 一贯最善于揣摩毛泽东意图的林彪给这次召见以及红卫兵领袖的“错误”以画龙点睛之笔：“你们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

红卫兵领袖们的“落伍”意味着红卫兵运动的衰败。文革即将转入一个新的阶段已不可避免。

召见之后，谢富治留下“五大领袖”，让他们整理并署名《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作为此次召见的文件，迅速传达下去。可能还有另一份关于此次召见的书面整理稿，因为，7月30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联名致信毛泽东、林彪，认为毛泽东的此次召见谈话“极为重要，提议将这次谈话的书面整理稿或北京市革委会正式传达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发到全国”。

后来，以“五大领袖”署名的那份“指示精神要点”正式公布、传达，它成为文革历史上当然也是清华文革历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献资料。

#### 四、影响

“七·二七事件”的影响大致上有三个方面：一是对文革全局的影响；二是对文革群众组织的影响；三是对教育界等领域文革的影响。

以“七·二七事件”为界线，特别是以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的结束为标志，表明了1968年文革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全国性的群众武斗不仅愈演愈烈，而且完全超出毛泽东的意料，完全有可能从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失控的危险，已到了必须遏制和结束这种武斗的时候了。

1968年元旦,《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又一次发表了在文革中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声音的“两报一刊”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提出“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能不能自觉地克服派性,是在新形势下愿不愿做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标志”。次日,中央文革小组专门向全国发出学习此社论的通知。《文汇报》1月12日还发表了社论《论派性的反动性》,历数派性“十大罪状”。《人民日报》1月16日刊登了《以毛主席最新批示为纲发动群众围剿派性》一文的编者按语。看来,1968年似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力图结束群众派性以及群众分裂的一年。

因为,从1967年春夏开始,全国许多省、市、自治区群众性的派别大武斗此起彼伏,绵延不断。所有这些武斗不仅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害,而且充分显示出了文革群众运动的诸多矛盾和弊端。更有可能的是,这些群众大武斗使文革走入了其难以意料的群众性“内战”。1968年春夏,已到了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必须从文革全局来加以遏制和结束群众大武斗的危机关头。从同年7月3日毛泽东签署批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制止广西壮族自治区武斗的布告,到7月24日还是毛泽东签署批发的由上述四大部门关于制止陕西省武斗的布告,再到7月27日毛泽东以派出数万人的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武斗的实际行动,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中共中央基本上遏制住了全国群众武斗迅猛发展的态势,并且由此给文革群众运动注入了某种致命性的因素。

到了1968年夏秋,文革群众运动已是千疮百孔、元气殆尽,仿佛已走入了历史的死胡同。因为,文革群众运动所必然经历或进行的武斗从根本上销蚀了文革群众运动的基础,并使文革群众运动走上了自我异化的不归之路。虽然1968年文革的焦点依然是群众性的问题,但是到了“七·二七事件”之后,群众性问题趋于从文革大局中渐渐淡出。进入1969年,在文革后来的八年里,文革群众运动已不能够与文革头两、三年里相提并论。文革群众运动在“七·二七事件”达到顶点之际,也就是其走向全面衰败之时。在此意义上,“七·二七事件”是文革群众运动的一个分水岭。

“七·二七事件”直接促使截至到1968年夏秋还依然存在和艰难发展的文革群众组织的衰落或消解。文革群众组织到了此时大有离心“无产阶级司令部”之虞。由“七·二七事件”所引发的对群众运动及群众组织所谓“多中心论”的批判和整肃,是给文革群众组织的致命一击。到1968年底至1969年初,全国大多数地区和单位的群众组织寿终正寝。

这主要是因为工宣队进入清华校内,向团派有关人员宣传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制止武斗的指示时,团派有关人员拒绝停止武斗和交出武器等,回答说:“我们不知道有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我们只听司令的!”这些人员怀疑毛泽东此一指示的可靠性,从他们内心来讲,即使有毛泽东的此一指示,他们也不会心甘情愿地听从。这种有悖于毛泽东个人崇高权威的所谓“多中心论”自然要受到否定和讨伐。《人民日报》1968年8月5日发表的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两周年的社论,道出了“多中心论”的实质及危险:

以毛主席为首的、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全党、全军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唯一领导的核心。……所谓“多中心论”是一种资产阶级山头主义、个人主义的反动理论,它涣散革命队伍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妨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倘若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要“以我为中心”,全国有许多个“中心”,仍旧是无中心。这种思想如果听任下去,而不加以纠正,就会走到脱离以至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的道路上去。

对毛主席的每一个最新指示,都要坚决照办,彻底执行。理解的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加深理解。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要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下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

显而易见，在毛泽东及“无产阶级司令部”看来，文革群众及其组织与毛泽东的关系必须始终以毛泽东为中心。8月13日，《人民日报》在转载《解放日报》《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社论的编者按中强调：批判“多中心论”关系到“要不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人民日报》的上述社论，不仅是对以团派为代表的文革造反派激进群众与毛泽东的互动关系的一个总结，还体现了毛泽东本人把这种互动关系加以转化。而这种转化恰恰来自上述群众愈发不可收拾或难以驾驭的大武斗，这种转化还使上述互动关系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几乎是质的改变，即毛泽东已不相信他昔日所发动并且所依靠的上述群众，结束了那种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文革初期无序的运作模式。毛泽东不但给几乎所有高院校的文革群众派出了直接领导者，而且至少还把教育界的造反派群众当成了文革对象。这一点最主要地表现在毛泽东派出工宣队接管清华大学等校文革运动领导权的做法上。

在向清华大学派出工宣队的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中央决定对教育部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事管制领导小组。进入8月以后，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加速进行教育界等领域的文革转折，并为此采取一系列的决策。例如，8月5日，毛泽东把巴基斯坦朋友赠给他的芒果转送给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以示慰问。8月15日，毛泽东还接见了该工宣队的代表。这些举动给整个工宣队以极大的鼓励。8月25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该通知说：“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已到，”决定向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派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全国教育界的文革。到8月底，北京的59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宣队。到1968年底，不仅全国大中城市的学校或教育部门，而且中国科学院、文化艺术单位或部门及出版社，甚至还有一些军事院校，都进驻了工宣队。

1968年8月，毛泽东发出了“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的指示，这意味着他把工人阶级置于知识分子之上的领导阶级，并且表明他把整个知识分子列入文革的对象。这不仅直接由于“七·二七事件”给教育界的文革带来了决定性的转折，而且通过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的武斗，使毛泽东深切地感受到，已不能依靠教育界的激进造反派来“完成”教育界的文革任务。根据清华大学这个典型，毛泽东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到了1968年8月，毛泽东已使文革的对象不仅包括1949年前学成和1966年前学成的所谓旧知识分子以及所谓走资派，而且演变扩大为文革初期曾作为文革先锋的红卫兵学生及青年知识分子。

根据清华“七·二七事件”的意义和影响，毛泽东指示姚文元写出“宜有一篇指导当前政治的文章”；根据毛泽东的两段重要指示，姚文元于8月22日给毛泽东送去了《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一文，并附信说：“……不知能否作为社论或署名文章在《红旗》用。”毛泽东对姚文元的文章作了三次认真细致的修改，把题目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并加上了“姚文元”的署名。

从此以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作为“毛主席最新指示”被大加引用。8月25日，《红旗》杂志第2期（次日，《人民日报》转载）发表了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作为文革的头号笔杆子，姚文元对毛泽东的文革新战略作了详细的发挥和阐释。

姚文元先是作了一番警告：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首先要保证“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工人阶级的最高战斗指挥部的每一个号令，都能迅速畅通贯彻执行。必须反对‘多中心论即无中心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种种破坏工人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倾向。……我们国家中，不允许存在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的任何大的或小的‘独立王国’。”对此，姚文元还煞有介事地拿前北京市委的所谓“独立王国”为教训。毛泽东在审阅到此时加写了下面这段话：“全国各地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的公民们，也应当研究这个教训”。

姚文元不点名地以清华文革两派的分裂及武斗为事例，总结道：“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上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言外之意，以青年激进学生为代表的一类知识分子已不能适应文革或者完成文革任务了。

进而，针对一些抵触工宣队进驻高校的论调，姚文元进行了驳斥，指出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最可靠的保证。”姚文元厉言惧色而又不点名地对文革新形势下的“蒯氏人物”大加斥责：“那种把工人当成‘自己’以外的异己力量的人的，如果不是糊涂，他自己就是工人阶级的异己分子，工人阶级就有理由专他的政”。紧接着，毛泽东加写了下面这段话：“有些自己宣布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

姚文元的此文是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清华文革两派对立和武斗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表态，是对“七·二七事件”所带来的文革战略转折举措的总结。此文已表明，“无产阶级司令部”已不信任“蒯氏人物”之类的“革命知识分子”了，这种人物曾几何时因反对文革伊始的工作组而被提携重用，而如今却因反对工宣队而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所恼怒和遗弃。

姚文元的文章表达出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关于文革战略新转折的历史性断定：“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地方，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推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这段话同样是毛泽东加写进去的。姚文元只不过转达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决定：工人阶级不但要到学校，而且要“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去”。

因而，在1968年年底，几乎各界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成为文革的对象是不言而喻的了。

□ 原载《南方周末》

~~~~~

【往事如烟】

老红卫兵刘卫东

• 廖亦武 •

算起来，老刘也属于中国最早的一批红卫兵，造过反，串过连，下过乡，那个时代的时髦都赶过。可惜地处边缘，这辈子注定进入不了主流社会。

而今，老刘面临下岗，“这又是一趟时髦！”他冲我苦笑。

老刘的愤世嫉俗源于历史的刻痕，他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感情，由此我担心“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民间仍有群众基础。虽然知识份子们为否定十年浩劫至今不遗余力。

这次采访是2000年6月30日下午在我家进行的，当时老刘通过熟人介绍，找我打听自己适合干什么“第二职业”？

老威：关于“文革”的历史，现在出了很多种书，您怎么看？

刘卫东：我根本没看。书价太贵，买不起。即使买得起，也没时间、没心情去看。这几年，我们厂大半职工都陆陆续续地下岗，每人每月拿两百来块钱。我在劳资科，没下岗，但也一天不如一天。听说某个私人老板正在与厂里谈判，要廉价收购，铲平那片几十年的老厂区，盖商品房，说不定明天早上醒来，我也会接到通知：永远下岗。根据土政策，像我这种78年进厂的老资格，能一次性地拿到3万5到4万。这点钱，我与老婆一点都不敢挥霍，得存起来给刚上高中的儿子，他一年读书的费用就要1万多。万一考上大学……算了，不敢往下想，这辈子就这样洗白了。49岁的人，在修理厂的岗位又是车工，要重新开始？太难了。

老威：是很难，但付出代价的又不是你一个人。

刘卫东：是啊，经历过“文革”的这批人，现在大多数都上有老、下有小，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哪来读书的闲情？80年代初，伤痕文学盛行，还要买杂志看，以后，再也没买过啥书，偶尔路过街边的书报亭，就停下来顺手翻翻，由于心里没想到买，也就不敢翻久了，怕遭人家白眼。我老婆倒慷慨，可都是买儿子瞎要的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成电视剧，实在没啥看头，连保尔都假得厉害，可儿子一吵，老婆就背着我给他买小说看。她说我们是夹缝里长大的，吃时代的亏，不能让下一代也在缝里扁着长。唉，一本老小说换个包装，就几十块钱，老婆卖小百货，这几十块就是她两三天的利润。

老威：您能给我谈谈“文革”中的经历么？

刘卫东：经历太复杂了，不晓得从何说起。

老威：您是什么时候参加红卫兵组织的？

刘卫东：1966年夏天吧，具体的日子记不清了。

老威：当时四川有名的红卫兵组织有川大八二六，红卫兵成都部队；还有重庆反到底，重大八一五，您属于哪一派？

刘卫东：我参加的是二四革命造反军。您可能不晓得，因为这是个县级造反组织，它的观点与川大八二六一致。

老威：好象书里没有记载。

刘卫东：书上记载的都是大地方，像北京、上海、广州，一有响动，具有全国性的影响。成都也有影响，但属于野史外传。再往下，造反组织多如牛毛，就有点闹农民起义的味道。不过二

四造反军在当时名声还算响的，我敢说，除了中江县的保守组织继光兵团（兵团司令为抗美援朝壮烈牺牲的英雄黄继光的母亲），就数盐亭县的二四军了。

老威：二四军有对立面么？

刘卫东：东方红兵团，这是个先保皇后造反的投机派别，后来被红卫兵成都部队收编。

老威：什么叫“先保皇后造反”？

刘卫东：“文革”初期，学校里刚有不安分的苗头，刘邓路线的工作组就进来了。工作组驻校，依靠的是党团组织，对蠢蠢欲动、串连造反的老师和学生实行审查，其中也包括反右、四清等历次运动中的专政物件。当时我16岁，也被审查，现在看起来都是鸡毛蒜皮的事：不守纪律、顶撞师长、与家庭成分不好的女生划不清界线等等。本来派工作组蹲点整风是我们党从延安时期延续下来的一贯方式，非常灵验，几乎都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在中学生中也搞人人过关，就过分了。还有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谁要革命就跟着毛主席，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就更过分，血统论，骂娘，大约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老威：据史料记载，中央派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其本意还是平息乱子，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因为从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来看，社会动乱最初的导火索往往是学校。

刘卫东：在当时人们的意识里，工作组就象征着政治运动，一搞运动，专政的物件，牛鬼蛇神都纷纷出笼。今天咱俩是同志，说不定明天就“你死我活”，人民内部矛盾随时可转化为敌我矛盾。工作组是钦差大臣，想宰谁就宰，而根正苗红的学生干部也大大发挥作用，成天帮助这个帮助那个，其实就是没事找事，挽个套让你钻。只要你向党交心，吐露真言，刀把子就握在别人手里。在五七年反右中，这叫阳谋，“引蛇出洞”，后来的大小运动，“引蛇出洞”就成模式了——反党定时炸弹就这样培养出来的。对此，大伙都心有余悸。像我们这代人，营养不良，身体发育晚，可政治上却成熟得早，父母经常用亲身经历的血的教训来敲警钟：这辈子只能一颗红心，向党靠拢，否则死路一条。

老威：工作组就是党？

刘卫东：绝对是，几十年一贯制，天大的委屈也只能咽下去，所以蹲点审查（叫党领导下的文化大革命）没多久，学生中的坏头头一揪出来，学校就恢复上课了。学校间的“煽风点火”也中断了，贴出的大字报也都是保皇观点。这咋行？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

老威：你赞成“文革”？？

刘卫东：赞成就是开历史倒车，这点常识我懂。但有人把“文革”的根源归罪于个人崇拜，我觉得片面。我们为啥崇拜毛主席？因为他老人家这次站在工作组的对立面，他在《炮打司令部》中数落的“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等快语，完全说到受排挤、压制、甚至专政的学生们的心里去了。既然有毛主席撑腰，就反他娘的。工作组、党、团领导整人整成了官僚，就是这批基层官僚，一贯瞒上欺下，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六一、二年，明明成片饿死人，还向上虚报成绩，称形势一片大好。唉，你太小，不晓得那时人们对工作组，对官僚主义都憋着一肚子火，毛主席在发动“文革”前，到各地考察，可能也意识到党的改造迫在眉睫。

文革一夜之间就满山红遍，工作组被撵跑，斗争的矛头直指党委，二。四革命造反军领风

气之先，与之对立，过去围着党委转的学生干部也弄了个“东方红兵团”，装模作样地造反。嘿，各单位都在成立组织，审查机关早瘫痪了，所以用不着登记、批准，只要聚几个人，开个会，刻个章，把红袖章一戴，扯一面红旗上街，就登场了。盐亭小小的一个县，可能几天就成立了上百组织。太热闹了，过节一样。

老威：这么多组织谁来管理？

刘卫东：没人管理，县委已经被攻占了，书记县长被捉拿。万人斗争大会那天，盐中的操场山呼海啸，每个组织的红旗都在招展。县委一班人，文教局一班人，盐中的白校长，还有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军警宪特、牛鬼蛇神都戴高帽、挂黑牌，被押上审判台，批斗了一上午，下午又接着游街。围观群众呼口号，吐口水，扔石块，打得走资派满脸淌血，还有些娃娃用竹竿追着抽，大伙都疯狂，把对毛主席的爱与对敌人的恨结合在一块了。你想，县长县委书记，平常谁能见上一面？高高在上的父母官啊，但现在，有毛主席为群众打气，就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了。

老威：整人就这么令你们兴奋？

刘卫东：不仅兴奋，而且高烧。这是历次政治运动栽培出来的。不同的是，过去大家是在组织的监督下背靠背地揭发，当运动员，可现在却倒过来，群起整过去运动大家的当权派，打死打伤不负责。就像在街上捉住小偷，不管丢没丢东西，你都想上去施展拳脚。法不治众，越狠越能逞英雄。我当时站在台上，负责揪斗白校长，大家一呼口号，我就与另一个红卫兵一起把那颗白发苍苍的头朝下按。白校长戴的高帽中，还加了铁丝与铅块，帽檐都陷进头皮了，我们还感觉不解恨。没几天，白校长就感觉受不了，整夜呻吟不止。有个半夜，他去解手，我守在厕所外，20多分钟仍不见动静，就进去查看，没人。我慌了手脚，忙报告总部。大批人马把茅坑搅了个底朝天，刚刚排除了自杀的可能，准备出通缉令时，有人报告，水井里有情况。我们用带钩的扯水竿子鼓捣了个把钟头，没结果。司令就派我下去“将功补过”。

我沿井壁下溜十多米，用手电筒一照，死人脸朝下泡在水中，我的毛根子汪地炸了，满耳朵都是狗叫，我急忙把铁钩搭上那衣领，自己吼着先上。不料刚把死人吊到一半，衣领豁了。那东西轰地栽回去，像深水炸弹。我只好再次下井，拿绳胡乱绕了好多道，弄扎实了。白校长终于露面，浑身青一块紫一块，脖子勒着裤带。人家是几代书香门第，就他背叛了家庭，在上大学时参加了地下党。毕业后被指派回乡，利用教书先生的职业作掩护为革命工作，解放后，他一直勤勤恳恳地当中学校长，埋头教学，错过了许多升迁机会。

这是一桩轰动一时的谜案，谁也说不清他是咋瞒过监管人员溜出厕所。况且上吊与投井，人只能选择其中一种自杀方式。有人谋害？可当时的白校长已成过街老鼠，谁会去悄悄谋害他？

老威：白校长是在你的眼皮下失踪的，公安局没调查你？

刘卫东：我的确说不清。不过“文革”的大形势这样，我写个材料，上面就定性为“畏罪自杀”。“文革”嘛，就是学生打老师，群众打领导的运动。连小学生都动员起来，剃女老师的阴阳头，所以某个单位的走资派一旦死了，就白死。某个区的中学校长原是农业专家，一年四季领导学生们半农半读，把校园变成了花果山。被县文教局评为走五七道路的典型，年年都有参观团上那儿去，不愧为世外桃源。不料“文革”一起，学生们摔了粪桶造反，把勤劳勇敢的走资派校长从果园揪出来，天天斗，每个学生都上台控诉。然后，红卫兵头头就天天押着校长沿田埂跑步，不管刮风下雨出太阳，都喊着“一二三四”的军训口令，一直持续了将近半年。终于有一天，校长一头栽进稻田，就再也没爬起来。走资派这么快就见阎王，学生们感到遗憾，就把尸

体支起来，开了个全校批判大会，再向上汇报。那时公安局从半瘫痪到全瘫痪，都是泥菩萨，谁为走资派立案调查，就是阶级立场问题。那年月，大伙一有机会就发泄积怨，就连小娃娃也经常扛着红缨枪，在街上拦着行人背《毛主席语录》，一旦有谁背错个把字，娃娃们就用枪头戳着你，勒令再背十条，若再错，就是对伟大领袖的感情立场问题，我在红卫兵总部，经常处理被娃娃们押送来的罪人，记下单位，勒令写检查，如果抵赖，说不定还要吃耳光，挨皮带，自己写检讨张贴出去，最后才通知你单位的造反组织来领人。

老威：这种红卫兵运动有点类似纳粹排犹或史达林的大清洗运动。

刘卫东：你有点危言耸听，其实斗走资派到后来也没劲了，人家啥罪都认，啥事都交待，很快就成了靠边站的死老虎。倒是东方红的势力不小，保皇卖乖，两头都占，还与二四争夺胜利果实。两大派从文斗到武斗，最后升级到真枪真炮。不过东方红在人民群众中的名声臭，最终还是“失道寡助”，被二四从盐亭县境彻底清洗出去。

活人斗垮了，红卫兵就响应领袖号召，“破四旧，立四新”，把红旗插向散布封建迷信的庙宇，盐亭虽是小县，但大大小小的庙太多，刻在石头上的菩萨更数不过来。庙好办，几钢钎把泥胎捣了，或直接把佛头敲下来，再乱砸一气，这比抄家工作量大，但比抄家简单，用不着登记反动书籍、信件、日记，作为被抄者的罪证。

刻在悬崖上的菩萨不好破，就从上面吊绳子拴人下去打，或用凿子，或绑炸药，弄完后，再刷上超级大标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最新鲜的是一所大庙里的和尚也造反，揪斗方丈和住持。红卫兵派了几十个战士到场助阵。小和尚们扯下封建主义的袈裟，也弄了身军装穿上，可惜没军帽，光着脑壳，呲牙裂嘴，像山上的棒老二。他们拽下老和尚的念珠，挂上黑牌，挨个声讨老和尚不准他们革命，只准念经学佛的罪行。一个小沙弥下山请了张毛主席像，要挂在大殿中，方丈更是不准，还说毛主席是俗人的神。小沙弥说到激愤处，竟挽起袖子扇了他师父一耳光，振臂高呼：“打倒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张和尚！刘尼姑是刘邓路线的小老婆！消灭封建迷信释迦牟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老威：这叫造反？公报私仇嘛，乱七八糟。

刘卫东：我们还必须绷着脸，想笑，用咳嗽掩护过去就完了。

老威：革命已经发展得如此荒唐，您就没怀疑过？？

刘卫东：像我这种平民子弟，能在风口浪尖上这么威风，连感激都来不及，林副统帅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老威：毛主席也没说让小和尚造老和尚的反。

刘卫东：造反是时代最强音，“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老威：不愧是红卫兵，“最高指示”张口就来。

刘卫东：我的青春、梦想、狂热与浪漫，都与“文革”有关。不管您怎么看，至少在“文革”初期的一到两年里，人民是享有充分的自由，甚至绝对的自由。不自由的，受压的是走资派，



是高干子弟，是特权阶层，他们平时高高在上，漠视民间的疾苦，今天，与以往任何政治运动都相反，世界翻过来，让他们也尝尝专政的滋味。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八次接见上百万的红卫兵，这在世界共运史上都史无前例。我也在红海洋里，跟着大伙一起欢呼、流泪，我们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挥着帽子，喊：“人民万岁！”真是人民与领袖心灵相通的时代，我们整整欢呼了几个小时，不停地跳，不停地挥红宝书，要是在平常，早晕倒了，然而此时此刻，连身体最弱的女同学都一直兴奋着，嗓子都喊哑了，冒烟了。过后，许多人好几天说不出话来，真的，嗓子出不了一点声。可多幸福，大家早晨起床，互相点头，微笑，心有默契地继续串连，像一群口含蜜糖的哑巴。也许，我们一生，就是为了那一天，那一刻而活着。

老威：现在还有圣徒的感觉么？

刘卫东：我为啥要否定自己的过去？否定那段历史？

老威：请别误会。

刘卫东：我这辈子没剩下什么，除了“文革”，值得回忆的还有啥子？

老威：我理解，您继续回忆，我在听。

刘卫东：我参加大串连就两个目的，一个是搜集毛主席像章，一个是亲眼见毛主席。我们组成一个红卫兵长征队，先到成都，住接待站，凭介绍信，免费吃住，还按人头分发毛主席像章。为了多要像章，我们就虚报人数，多跑接待站，然后到成都剧场门外。那儿成天人山人海，既是观点不同的造反派别的辩论阵地，又是交换毛主席像章的集贸市场，什么样式都有，我们在里面泡了个把星期，开了眼界，结识了不少新战友。因为串连的长征队铺天盖地，各接待站招架不住，连电影院剧院的舞台都腾出来了。那年头，人民币几乎都作废了，凭介绍信，完全能跑遍全国。

我们等了若干天上京列车，太挤，根本上不去。最后，只好约了大群新老战友，一顿冲锋，终于从车窗进去了。这哪是装人的，纯粹就是装鱼的罐头，人人背贴背，连出气都困难。但熬也要熬到北京！已经9月了，老是听说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再晚就彻底没希望。

火车跑跑停停，也没个到站时间，像开着玩。每停一站，都要经受一次考验，人肉是软的，挤一挤，靠一靠，能多装就尽量多装。他妈我要是石头就好了，占了地盘就纹丝不动，没弹性，挤不坏。尽量少喝水，因为厕所绝对上不了。女同志怎么方便我不清楚，总之男同胞憋急了就掏家伙对窗外扫射，还得事先招呼邻座关窗，以免“飞尿伤人”。有个娃娃脸的红卫兵憋不住大便，钻了半个钟头也到不了厕所，只好向靠窗的战友一个接一个行军礼，于是很多人道主义手臂托住他，让他站上茶桌，把不争气的屁股塞出窗外，拉了一泡极丢脸的屎。大伙轰笑着，女战士们忙把脸转开。非常时期，都是革命战友，谁也不会取笑谁。

也许您不相信，现在两天的上京路，那时要走五六天。我一天一顿饭，憋屎憋尿，拢北京时，膀胱都出毛病了，胀得要命，可站在便槽老半天，就出不了尿。经过一番挣扎，那儿象藏了根烧红的针，出尿时滋滋地响，浑身都湿透了。

接见那天，我们半夜3点就起床，出发去天安门，但就这样也晚了，四点多钟，长安街两头就封住，根本进不去，我们绕道前门，听从指挥，随大流从纪念碑右侧进入广场，月儿高挂，与华灯辉映，一望无垠的绿军装与红旗……我相信，在场的每个人都为能生在毛泽东时代而骄傲。

后来的情景我刚才讲了。人是应该有信仰的，信仰使人变得纯洁，勇于献身。

老威：所以有了规模空前的武斗，两派热血战士都为了信仰而拼得你死我活，有的父子、夫妻也因派性而反目，兵戎相见。

刘卫东：总比现在为了一点钱而拼得你死我活强。少女为了钱，可以去当三陪；贪官为了钱，不惜以身试法，用老百姓的社保基金去作私人交易；儿子为了钱，甚至可以勒死老母亲。有信仰的乱跟没信仰的乱是两回事。两派武斗，部队支左，全国开锅了，谁平息得了？毛主席一声号令，哪个敢不交枪？盐亭是全川第一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县，成立大会那天，县城有83万人马，你想象得到一个总人口不足十万的小城，能装下这么多人？可咋样？就装下了，生活照常运转，因为有五湖四海的支援。我记得毛主席发表“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那阵，我们正在挖断通往富驿的公路，埋地雷，以防东方红借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兵力卷土重来。但最高指示一下，我们马上填平深坑，撤掉路障，放下了武器。

老威：据我所知，许多当年的造反派头目都在利用各方面的老关系，做大生意，像川大八二六政委江某某，工人造反兵团司令邓某某，重庆反到底的邹某某，重庆八一五的黄某某，当年都是省革委常委，受过江青的接见，即使坐牢也效忠四人帮。可出狱没几年，就彻底改头换面，融入经济大潮了。他们中生意做得最火的，要数红成司令蔡某某，盖了整幢大楼，据说是本市最高的建筑物，还开了一所民办大学。

刘卫东：他们发财跟我有啥相干？

老威：向您提供一点资讯，仅此而已。老刘，您晓得作家张承志么？

刘卫东：不晓得。

老威：联动呢？

刘卫东：晓得，北京的贵族红卫兵嘛。

老威：红卫兵这个称呼据说是张承志发明的。

刘卫东：你晓得的还不少，可惜有些势利，眼皮朝上不朝下。说好红卫兵最终的目标是传播毛泽东思想，解放全人类，可这些风云人物，发达了，连广大落难的老红卫兵兄弟也不来解放，我三四万元了结一生，说惨也不惨。老红卫兵都当知青去了，据说现在还有许多没返城的，陷在农村，被社会遗忘了。前段时间的电视里，还播了某个茶场的知青扎根至今的现状，破屋烂衣狗食，比叫化子不如。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回到故乡，拿城市户口，吃商品粮。

~~~~~

## 【难忘岁月】

### “文革”万花筒：武斗

• 江岩声 •

武斗那年是1967年，我12岁。

元旦是个晴日，很冷，有风，雨山湖面结着冰。三哥带着我，去市工人体育场看批斗市委书记的大会。要走一个半小时，其中有半小时的路是踩着铁道上的枕木走的。在公路和铁路交叉的地方，有小贩卖炒花生。三哥买了两毛钱的，分给我一半，把我所有的荷包都装得鼓鼓的。一路吃着走去，又一路吃着走回来，到家时裤兜里还剩几颗花生。从来没有这么痛快地吃过花生，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一想起武斗，就想起那两毛钱花生，虽然两者毫无关系。

市委书记名叫黄驭。“文革”前，他雄心勃勃，要把我们市建成“江南一枝花”。其规划的中心内容，就是要让雨山湖和杭州西湖媲美。湖边立了一个大牌子，画着未来的雨山湖：杨柳垂岸，湖水清清，曲廊连着湖滨大道和湖心亭。一段时期内，整个雨山湖的水都被抽干了，全市的人都到湖底挖淤泥，我们三年级小学生也不例外。后来不知为什么，并没按规划完成。既没有湖心亭，也没有曲廊，湖水还是那样浑浊。那个大牌子自然也不知去向。

批斗大会很让我失望，偌大一个可容万人的体育场，一大半都空着，只在主席台前面聚集着一群人；几面红旗，东倒西歪，在寒风里抖动着。主席台上有几个人，或站或坐，至于哪一个是市委书记，我到了也没搞清楚——我眼睛近视。

不久，从上海刮来了“一月风暴”，夺权了！

夺权，是“文革”分水岭。之前，是造反和保皇，人们分成造反派和保皇派；之后，是“夺权好极了”和“夺权好个屁”，人们分成“好”派和“屁”派。在报纸和正式文件里相应的称呼是 G 派和 P 派。

“好”派的成员来自造反派或其同情者，而“屁”派的主流则源于保皇派。当然，大浪淘沙，不免泥沙俱下，就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的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 第385页）

以我家为例，常住人口五人，分成三派，我母亲是“好”派；我父亲是同情“好”派的逍遥派；我是“屁”派，因为三哥是“屁”派；我姐是什么派，想不起来了。但她沾过造反的光：免费乘火车到北京串联；到北大、清华读大字报；数九寒天，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等待毛主席检阅。那时她还不到十三岁。回来时买了北京的巧克力，比煤炭还黑，比石头还硬。我三哥其实也沾过造反的光。串联的时候，因为家庭成份问题，学校不让去北京，不给开介绍信，他就一个人背着棉被和毯子西行漫游，上海、杭州、南昌、桂林、贵阳，一直到了重庆。回来时给我买了一把玩具手枪，可以打装有火药的纸泡卷，发出“啪啪”的响声。此外，还带回一身虱子。我妈把他里里外外的衣服都放在一个大盆里煮。有这么痛快地免费旅行，他怎么就成了“屁”派？我至今都想不明白。

其实，“文革”到了夺权“好极了”或者“好个屁”的时候，人们已经不那么富于理想激情了。阿克顿勋爵有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话在夺权之初，并不适合。那时，好像腐败还不是社会痼疾。是有个别腐化现象，但那都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在那个类似清教徒的社会里，公安局的不定期宣判布告上面那些含有“腐化”、“堕落”、“强奸”、“猥亵”等字眼的段落，可以说是当时唯一的准性文学，吸引了许多聚精会神的读者。

权力是什么？在我当时的概念里，就是公章，就是一块块木头疙瘩，圆的，像一颗颗缩小的木柄手榴弹。所谓“夺权”，就是看谁把单位里的公章夺在手里。一章在手，就能开介绍信。那个时候，成立战斗队要介绍信；外出旅行买火车票、住旅馆要介绍信；连买点绸布制作红旗、红袖章什么的也都要介绍信。

这样的权力导致的不是腐败，而是“文攻武卫”。武斗，则是“文攻武卫”的必然结果。在我住的那个江南小城，武斗的源头虽然在那些木头疙瘩，但其直接导火索，却是一个“好”派红卫兵，一所技校的学生，只有十几岁，爬上一个我们当地人称作大公司的大楼的顶层，往旗杆上挂红旗的时候，坠楼身亡。“好”派怀疑是“屁”派暗下的毒手，就组织了全市大游行。人们抬着那位红卫兵的尸体，高呼口号，“血债要用血来还”。武斗从此爆发。

那小城分三个区，呈品字形分布。“品”字头上那个“口”是“好”派根据地，主要是些市属单位，例如电厂、码头等；左下方那个“口”是“屁”派地盘，分布着一家钢铁公司的主要工厂；右下方那个“口”是双方拉锯地带，我父亲工作的大公司的大楼和我母亲当护士的医院都在这个“口”里。我们家也住在这个“口”里。

武斗之初，参战双方还是比较文雅的。我观看的第一场武斗，是“屁”派攻打我妈她们医院大楼。大楼是白色的，坐北朝南，从南面看，形状像个“而”字。医院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是女人成堆的地方。这样的人，“文攻”略略有余，“武卫”则远远不足。虽然四条通往二楼的楼梯都焊上了铁栅栏，但“而”字那些竖道道之间所夹着的无数的窗户，仓促之间是没办法一一焊死的，于是，攻守双方互相扔了一些石块以后，战斗就结束了。傍晚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我看见许多白衣天使，高举着双手，在漫天的彩霞中，像一朵朵白云，从“而”字正中央的大门里鱼贯飘出。我妈没在其中。那天中午，她见形势不好，就跑回家来了，下午没去上班，就没有陷入包围。

我妈在医院里是参加造反比较早的人，但到了“夺权”的时候，全身而退，成了逍遥派。可能是我父亲的意见起了作用吧？父亲在1942年“肃托”运动时吃过老毛“引蛇出洞”那一套技法的苦头。“文革”之初，造反刚刚兴起，他就给我两个在外地上大学的哥哥写信，告诫他们不要脑袋发热，要埋头读书。

后来的武斗，就比较残酷了。双方参加武斗的主力都换成了工人，操长矛，戴柳条帽，着深蓝色工作服。也有穿白色帆布工作服的，来自炼钢厂。工人们或扛着长矛，或提着棍子，排着队，喊着口号，从街上走过，威风凛凛。共产党历来认为，工人阶级特别能战斗。这个论断，在武斗时期也得到了验证。

于是，就发生了硬仗，有了死伤。元旦那天我走过的铁道旁有一条河沟。武斗期间，我就是在那河沟边第一次见到被打死的人的。是郊区的农民，“好”派一边的。草丛里，两具尸体，肚子鼓鼓的。据说是因为受伤后失血过多，口渴，爬到河边喝水灌的。其中一个，脸部被戳了几个大窟窿，看着非常恐怖，我现在都能想得起来那张猩红色的脸，还有那股腐尸的臭味儿。

武斗的高潮，是“好”派攻打大公司的大楼，时为“屁”派据守。“好”派从“品”字头上那个“口”出发，长途奔袭，掏心战术，一大清早即团团包围了大楼，又四处派了人马阻断“屁”派可能的增援。这章法便很有些军事行家的味道了。制订此次奔袭计划的人一定熟读过老毛四卷雄文中关于反“围剿”和辽沈战役的那些不朽篇章，可能还看过多遍电影《南征北战》。

战斗于清晨打响。双方还是对扔石块。守的一方，居高临下，从三层楼顶上把整块砖往下

扔，砸到水泥马路上发出“咣咣”的响声。攻的一方在楼下，是仰攻，往上扔石块，很费劲，徒手扔只能砸到一楼，最多二楼的窗户。要想扔得更高些，得用根绳子，对折，中间兜一块石头，就像体育健将扔链球，在空中绕两圈，猛一松手，“日一”的一声，那石块便取切向，沿抛物线途径，飞向三楼。如果击中窗户，而且那窗户上还有玻璃的话，就会听到“哗”的一声，大块的玻璃从三楼掉下来。这样扔石头，当然得有技术，出手必须恰到好处，早了，会砸在自己眼跟前的地上，白费力气；晚了，会扔到自己的后方，伤了战友或者围观的百姓。

围观的百姓？是的，这种武斗，看的人比参加的人要多得多，如同看戏，只不过是真刀真枪地演，把对方往死里打地演。我在电视上看见美军坦克攻入巴格达的时候，就在想1967年的武斗。我想两者的情形应该差不多，不同的只是武器。武斗之年，我还太小，不懂得“人生如戏”；如今，积起了一把年纪，知道了那四个字的重量，却没戏了。

大公司大楼的西面20米处有栋实验楼，二层，我父亲常去那里工作。大楼的北面 and 东面，隔着马路，有几栋三、四层高的民房，那种包浩斯式的红砖建筑。在那一天里，那些房子的窗口就相当于戏院的包厢，从每一个包厢里都伸出几个头来，坐家观虎斗。我家不住那儿，也不认识包厢里的任何人，只好爬到北面一栋楼的楼顶。已经站满了人，都在翘首观望。

大公司大楼是“屁”派从“好”派手里夺取的，就在那次“屁”派进攻我妈医院的同一天。“好”派当时守楼的都是些大公司的机关干部，本来就没什么战斗力，又是仓促应战，大楼没经过什么防御处理，所以，很快就被“屁”派破门而入。机关干部就举手投降了，像医院里的那些护士一样。

“屁”派占领大楼后，加强了防御。一楼的所有窗户都封死了，装了铁栅栏。大楼共有三个入口，全都焊上了铁门；通往每一层的楼梯里也都装了铁门。楼顶上沿着胸墙，码了几圈砖头，准备朝下扔的。还准备了氧气瓶，一人高，水桶粗，形状有些像现在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小孩子们都传说，只要一个氧气瓶爆炸，就能炸平我们那个区的所有楼房。

所以，轮到“好”派来攻打的时候，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看见一辆载重卡车，顶部装有钢板，试图接近大楼的大门，后面跟着一些拿梭镖的人，如同士兵跟着坦克。楼顶上的高音喇叭喊着，“老百姓远离！老百姓远离！”如此几遍以后，“咣当”一声，真的扔下一个氧气瓶！那些拿梭镖的一下都逃走不见了；那卡车开足马力，屁股冒着黑烟，轰轰地开走了。

并没听到爆炸声。高音喇叭喊道，“这是警告！这是警告！‘好’派工人兄弟们，你们不要再上一小撮坏人的当了，替他们送死。你们要认清形势，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一边来。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之后，战斗就进入了相持阶段，很沉闷，也不怎么扔石头了。只是那高音喇叭不停地哇啦哇啦，是清脆的女高音。她时而呼吁“要文斗，不要武斗”；时而喊着“我们的援军就要到了”；时而播放毛主席语录歌，“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时间已过了中午，我早上就离开了家，这会儿饥肠辘辘，头又开始痛起来——我那时经常头痛，因为近视而又不戴眼镜。就在我犹豫是不是回家的时候，大公司大楼西面的实验楼进去了几个端着枪的人。他们走到实验楼二楼最东面的房间，把枪从的窗户里伸出来，瞄着对面大公司二楼和三楼的窗户。窗户下，架起了两道云梯。两溜人，有的拿着枪，有的拿着梭镖，一个跟着一个，撅着屁股，顺着云梯，往上爬。

大楼的其它窗口里看不见任何动静，只有那竖在楼顶上的高音喇叭还在喊着口号，“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党中央”。前面说了，我是“屁”派，看到这里，真是着急。旁观者清，人家都进了楼，怎么不给他一个反冲锋？人都藏哪儿去了？

不一会儿，楼里传来了噼噼啪啪的响声，像爆豆一般。有人上了楼顶，把“屁”派的旗帜用脚踹倒，把已经不再响了的高音喇叭摘掉。看到这里，我就下楼回家了，头痛得受不了，心里堵得慌，不服气，想：“这么多的人，打那么少的人，算什么本事？还值得放鞭炮庆祝？”

民居楼上的那些包厢里，正传来收音机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安徽人民广播电台……三千万江淮儿女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决心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接着，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音乐，咪咪一来咪嗦嗦一咪拉嗦咪嗦来喜拉索刀刀——刀，咪刀来咪嗦咪来刀咪——，拉刀来刀咪喜拉嗦嗦——，……街上走着一群一群的人，像刚散了一场戏似的。我听到有人议论说，刚才那大楼里不是放鞭炮，是在放枪！

三哥得知我要写那次武斗，给我提供了下列素材：

“到下午5点多钟，‘好’派撤离了大楼，押走了十几名俘虏，留下了‘屁派’的十几具尸体和重伤员。有一些群众把大楼里的尸体和重伤员抬到旁边的机关食堂里面暂时停放。我看到一个被枪打死的人，躺在那里，（表情）很平静，子弹是从肋下射入的，没有什么血，没有看到子弹在他身体上的出口。一个伤员的脸已经分不清眼、鼻、嘴，满脸的血和肉，牙齿龇在那里，还在呼吸，应当是嘴巴的地方血泡在一鼓一鼓的，大约是被钢钎子捅的。心想他恐怕很难活下来。心想，他们当时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敌众我寡，毫无希望，为什么不投降？是应当像当初‘好’派的机关干部战士们那样投降，还是应当顽强抵抗，被人打死？是不是工人战士与机关干部战士就是不同？”

作为开枪的佐证，我认识那些俘虏中的一人，是公司大会堂的电影放映员，姓高。他被释放以后，在我们楼上的一个邻居家住了几天。听他说被打伤的经过，真是惊险。他是从一个办公室，一步横跨过走廊，到对面的办公室去的时候，腿上挨了一枪的。他撩起裤子，给我们看枪眼。那眼很特别，肉是往外翻着长的，像个放大的肚脐眼。

那次武斗之后没多久，解放军支左的队伍就来了。一天早上，四面八方响起了嘹亮的军号声，解放军像绿色的潮水，分三路涌入我们那个区，最后又汇聚到一个点——设计院，在我们那个区的最南面。

来安徽支左的是解放军12军，原二野序列，军长李德生。他提出一个“和稀泥”理论（因为和稀泥，李德生受到毛泽东的赏识，先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副主席）。他说，无论G派、P派，都拥护毛主席不是？都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不是？那么，大家就都是革命派。军队不偏不倚，混乱的局面很快稳定下来，大人们都放下了武器。

然而，树欲静风不止，大人的武斗停止了，小孩的开始。规模大的时候，几个街坊的孩子，成百上千，联合起来，与另外几个街坊的孩子的联军对阵。双方使用的武器，从弹弓到梭镖，到火药枪，也戴着柳条帽。我参加过这种武斗。有一次，围攻一个山头，对方射来的火药枪弹，就打在我身旁两米的地方。枪弹着地，发出“啪”的一声，冒出烟来。

那时最让我着迷的事情，是看解放军演习。一群军人，也不射击，只是架着机枪，端着自动或半自动步枪，作瞄准状。现在想来，很可能是炫耀武力的一种方式，以震慑那些还想武斗的两派。

那种演习没什么看头，但我仍能一下午一下午地泡在那里，不是看别的，是研究机枪或自动步枪连发的原理。孩子武斗的时候，制作火药枪成风，水平越来越高，可以做得比小孩的巴掌心还小。我的一位同学手很巧，制作袖珍火药枪时，走火打了自己的手心。但是，没人能做得出来可以连发的火药枪。

等我弄懂了自动步枪连发的原理，知道无法做得出来连发火药枪的时候，已经是秋天了，因武斗而关门多时的学校复课了，我们又回到了课堂。孩子们的武斗在那年的冬天也就基本结束了。

理论上，“文革”还要持续八年，但那八年并没有什么意思。因为，随着武斗之年的结束，大规模的、自发的群众运动也就结束了。“文革”从“阳谋”转入“阴谋”，转入秋后算账——“整人”的时代，转入漫长的“重新收拾旧山河”。

武斗，是小城历史上最大的“城殇”。三十七年过去了，沧海桑田，斗转星移，中间发生了多少事情！就连那栋大公司大楼，也在一波又一波的拆迁浪潮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保皇派（包括走资派）与造反派之间的前嫌旧恶，“屁”派与“好”派之间的血海深仇，直到今天，依然像个幽灵，在那小城的上空徘徊，左右着一些人对另外一些人的看法，影响着小城的政治和经济。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邮箱：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          |
|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             |          |
|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             |          |
|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             |          |

---